

# 一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鸿篇巨制

## ——读殷作斌教授的《殷代史》书稿有感

■ 兰文种

读书,读电子书与纸质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悟。

4月15日下午,80多岁的殷作斌老教授从淮安市快递来他201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殷代史六辨》专著以及即将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殷代史》书稿影印件等书,记者小心翼翼地翻阅这两本厚重书籍的章节,对殷老先生肃然起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连书前彩页、序及目录近500页约60多万字的《殷代史》影印书稿,是殷老先生《殷代史六辨》一书的延伸和扩展,更是老先生研究殷商王朝历史60余年的心血……

而今除《史记·殷本纪》以外的现有殷商史书,大多学术气氛太浓,篇幅庞大,只在学术圈子里流阅,普通读者很难读懂。然而,殷作斌先生的《殷代史》却是一部还原曾被丢失的三千多年前殷商王朝五百七十四年真实历史的史书,其诸多崭新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其许多记载可能使目前殷商史研究领域中的诸多千古难题迎刃而解。纵观殷作斌先生《殷代史》一书,有八个感悟:

### 一、在内容编排上突破传统史书的四大创新

殷作斌先生的《殷代史》书稿在内容先后方面采用了特殊的编排方法,它突破传统史书“按君王更替次序著史”或“按年著史”的常规,把《考古学揭示的殷代文明》放在开篇之卷《卷一》中,把已被考古资料确证的殷商时代最重要的文明,如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系统、青铜文明、农耕与历法、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等优先介绍给读者,迅速地拉近读者与久远殷商文明的心理距离,激发了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此为一大创新。

除此之外,该书在文字风格和编辑技巧上遵照清华大学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关于“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的教导,还有三个显著的创新:

一是写作目标是在文字风格上通俗易懂,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便能读懂。

二是将正文和注文部分分开编排,以求雅俗共赏,让不同阅读兴趣和不同学术水平的读者各取所需。在该书中,凡是必须引用甲骨卜辞、考古发现和其他难懂史料才能准确阐明学术问题的文字,绝大多数放在正文后面集中编排的注文中。也就是说,该书的注文部分是专为搞殷商史研究的读者服务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以只读该书的正文部分,注文部分仅供作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

三是采用了有效控制篇幅的特殊编排技巧。这种编排技巧特别体现在《卷二(殷商史事要览)》和《卷四(殷末风云)》的编辑中。以《卷二》为例,全卷共十章。每一章都对应殷商时期的一件宏大的历史事件。如果按常规编写,这每一件宏大的历史事件都可以展开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但在《卷二》中,这每一件宏大的历史事件的内容都被高度概括成用通俗文字表达的一件“要览史事”,作为一章编在《卷二》中,这样就能大大地压缩《殷代史》全书的篇幅。

### 二、殷作斌先生涉足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机缘

殷作斌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高材生,毕业后在国防科研部门工作,后来受国家照顾调回家乡江苏淮安,在淮阴工学院任教,直到2001年退休。由于参与编写《殷商族志》的机缘对殷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搞清楚殷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殷作斌教授拜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原会长王宇信教授为师。

公元2015年,在李伯谦教授的指导下编辑并出版了殷商史学界的著名辨书《殷代史六辨》。2020年在对当代殷墟研究有巨大影响的学术巨著《殷墟文化大典·商史卷》(上、下册)主编、安阳师范学院郭胜强教授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胸阳殷氏宗谱》。该谱因其编辑体例的全面创新在共有2196部家谱参与评比的2020年郑州全国家谱展评大会上荣获“最佳创新特等奖”。2022年,遵照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的嘱托,终于完成了将《殷代史六辨》扩写成《殷商族志》的宏愿,并依据其国史内容多于族史内容的特点,将其易名为《殷代史》。

《殷代史》书稿是殷作斌教授业余研

### 殷作斌简介

殷作斌,字胸阳,号丹宇,1941年1月22日生,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南禄乡人,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就读。江苏省高等学校一类优秀课程奖获得者、电子学专家、淮阴工学院著名的双师型人才,发表过许多篇电子学论文。因祖传一本出于魏晋谱的《殷氏家传》,使他读高中二年级的青年时代起就爱上古史,业余研究夏殷周三代史六十多年。退休后,潜心中华殷商传承文化的研究,为筹建淇县朝歌中华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会呕心沥血,先后编著《殷代史六辨》、《胸阳殷氏宗谱》等著作。

《殷代史六辨》的主要内容已被载入由殷商史和甲骨学科学家王宇信主编的2021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殷墟文化大典》中。目前,殷作斌先生的史学和现代化的谱牒著作均已被国家及北京、上海等各省市、各著名大学、历史研究等单位图书馆、部分博物馆和海外地区图书馆收藏。

究殷商王朝历史六十余年的结晶。老先生研究殷商王朝历史的机缘源于其家祖传一本其首页记有“出于晋谱”的《殷氏家传》。据其回忆说,那还是1959年他上高中二年级时的事。那时,他有超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一般的文章,只要读几遍,便能背诵;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那么难懂,他读完便理解了全书。当时他长兄殷作超见他记忆力好,能背诵《三国演义》,并绘声绘色地讲给小伙伴听,于是便命他熟读“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殷氏家传》。他长兄当时对他说,这种关于家族史的重要史书,记在脑子里最安全。于是从1959年读高二起,到1962年上大二止,他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将完整的祖传《殷氏家传》一字不落地背熟。背熟记在心里之后,就将那本按家规“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殷氏家传》还给他长兄收藏。他长兄时任校长,在“文革”遭批斗恐吓,吓得连同他做私塾先生的曾祖父殷高良留下的许多手抄殷商族史研究文稿和书法作品都被付之一炬了。特别是那本置于特制密封铁箱内藏于夹层墙中,虽躲过抗日战争一劫的传世文献《殷氏家传》,却不幸毁于“文革”的“造反派”威胁之中。

据殷作斌先生讲,他新编这部《殷代史》书稿中一系列新观点的形成,几乎都与他家祖传的《殷氏家传》有关,但由于《殷氏家传》已被毁而不可复得,因此,他在《殷代史》书稿中,据《殷氏家传》的记载每提出一个新观点时,所引用的论据和辅助史料的出处,均以学界公认的文献或考古发现为准,除了《卷六(殷代纪年)》中有部分纪年资料采用《殷氏家传》资料以外,基本上没有仅以《殷氏家传》的史料为据的。

### 三、《殷代史》解决了困扰学界两千多年的殷代纪年问题

甲骨文和大量考古材料的横空出世,虽然证实了传说中的殷商王朝为真实存在,但关于它的纪年问题却难于理出头绪,以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花了五年时间也只给出一个取整断代的框架而已。

(一)殷商王朝开国大帝成汤建国始于哪一年,历时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只给出始于公元前1600年的大致判断,《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成汤于其在殷侯位的第十八年癸亥即天子位的记载推断殷代起始年为公元前1618年癸亥。因为按照《殷氏家传》的癸亥年记载,可选的殷商王朝起始年代只有公元前1498年、公元前1558年、公元前1618年、公元前1678年等几种可能,考虑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碳14测年给出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610年至公元前1580年之间),笔者认为《殷代史》书稿将成汤即天子位年“癸亥年”定为“公元前1618年癸亥”是符合史实的。

(二)上述推断虽可确认成汤即天子位之年为公元前1618年癸亥,但成汤究竟是哪一天即天子位的呢,即是说殷商王朝的建国日究竟是哪一天呢?对此,史无记载,甲骨文中似乎也未发现这方面的记录,但《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关于成汤于“十八年癸亥元日即天子位”的记载,再运用许剑伟《寿星天文历》给出的推算方法,推算得成汤建国日为公元前1618年2月20日,相当于中国黄帝纪元1081年正月初

一日或干支纪元癸亥年甲寅月壬辰日,这应该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它对夏代历史的研究必然会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众所周知,导致殷商王朝覆亡的牧野之战发生于三千多年前某年某月的甲子日,但具体是哪一年的甲子日呢?截至至1997年5月1日,历代前贤专家共推算出44种可能的年份。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用了五年的时间,使用文献、甲骨文、考古材料、碳14测年、日月食测年等多种手段对夏殷周的年代进行断代,最后一锤定音推得牧野之战发生日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且还不一定是对的。《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关于殷商王朝末帝帝辛(纣)于“丙申年甲子日”失国的六字记载,很容易就推算出殷商王朝覆亡的准确日期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这与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据“天象”推算的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科技效果完全一致。然而,《殷代史》书稿所用的下述推算方法远比江晓原教授所用的纯“天象”推算方法简单而明了:

众所周知,现代碳14测年给出的殷商王朝“约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覆亡,结合《殷氏家传》关于殷商王朝覆亡于“丙申年甲子日”的六字记载,可立即推知,殷商王朝的覆亡日必定在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内,也就是必定在公元前1045年立春时刻(公元前1045年2月13日23时59分17秒)至公元前1044年立春时刻(公元前1044年2月13日5时44分52秒)之间的丙申年内。由许剑伟《寿星天文历》很容易查得,在帝辛(纣)末年的这个丙申年中,只有六个可选的甲子日,这样就可将帝辛(纣)失国的甲子日筛选范围从丙申年的一年时间缩小到六天的范围内,再由文献记载或“西周利簋铭文”记载的牧野之战发生日呈现木星当头的特殊天象,可立即从帝辛(纣)失国的六个可选甲子日中进一步确定只有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甲子日(相当于公元前黄帝纪元1654年十二月初四日或干支纪元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才是牧野之战发生的准确日期。

(四)殷商王朝积年的推断。《殷代史》书稿据上述殷商王朝肇始于公元前1618年的标称干支年癸亥,覆亡于公元前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很容易算得殷商王朝的准确积年为574年(1618-1045+1=574)。

(五)盘庚迁殷年的推断。《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记载的盘庚元年庚辰、崩年丁未和盘庚于在位第十四年迁殷的记载,很容易推算得盘庚于公元前1301年庚辰至公元前1274年丁未在位,共在位28年,于公元前1288年癸巳迁殷。

### 四、成汤的国号为殷不为商,只有将夏商周三代改为夏殷周三代才符合史实

《殷代史》书稿列举大量的证据,证明成汤的国号为殷不为商,也不是西晋皇甫谧说的盘庚迁殷前称商、盘庚迁殷后称殷。《殷代史》书稿经充分论证后,向殷商史和甲骨学界提出两项建议,以免误导研究方向和影响下一代对成汤国号的准确认知:

一是建议专治殷商史的科学家宋镇豪在其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再版时更名为《殷代史》;二是建议国家教育部将现行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说法据史实更正为夏殷周三代的说法。

目前,有些学者认为,成汤国号是商是殷只是“习焉不察的小问题”,殷作斌教授却有另看法。他举例说,而今世界上有人故意将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写成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我们能认为是“习焉不察的小问题”吗?他在《殷代史》书稿中提出,成汤国号是商是殷的争辩不是小事,而是事关成汤“国号”或“朝代号”正名的大事,甚至是“刻不容缓”的急事。因为目前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课本,教给学生的上古三代朝代名称都是值得商榷的“夏商周”,而根本不提“夏殷周”,如此一代代传承下去,再过一两百年,人民大众就只知道成汤建立的新王朝朝代名叫“商”,而不知道成汤建立的新王朝的本名叫“殷”了。

何以为证?概括说来,《殷代史》书稿论证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的证据和解释如下:

(一)考古材料证明,周朝时殷商王室的直系传人——宋公室人对成汤建立的前

朝是称殷不称商的,其证据是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详见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01期。此项证据能证明有学者说“殷”是周人对前朝的贬称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墓主人正是子姓宋公室第28位君主宋景公头曼的亲妹妹,如果称“殷”带有贬义,那么周代子姓宋公室人是绝对不会称“殷”的,子姓宋公室人是绝对不会自己蔑视自己的祖宗的。

(二)考古材料证明,包括周代官方人士在内的周朝人对成汤建立的前朝是称殷不称商的,其证据是湖北随州文峰塔M1号春秋墓出土的A组M1:1编钟铭文,详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4/总第133期。

(三)孔子、孟子对成汤的国号是称殷不称商的。

(四)司马迁《史记》将记载殷商王朝历史的篇章命名为《殷本纪》而没有命名为《商本纪》,司马迁不可能看到的《竹书纪年》将记载殷商王朝历史的篇章命名为《殷纪》而没有命名为《商纪》。

(五)甲骨学“四堂”之一、学界公认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在批判学界一些人梦想仅依赖甲骨文(而轻视传世文献)就想写出百分之一百的殷商王朝历史时的用词总是“殷代文化”“殷代文化史”,而不使用“商代文化”“商代文化史”的词语。

(六)港台史学界权威学者、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李定一教授在其权威著作《中华史纲》中说:成汤“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为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于为宗庙所在地而已。……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

(七)据说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之所以认定成汤国号为商不为殷,主要是看到甲骨文中“商”“商王”等词语频频出现,而“殷”字非常罕见,“殷王”“殷帝”等词语根本不见的缘故。对此,《殷代史》一书另有解释:

①《殷代史》书稿据《殷氏家传》的记载认为,为了团结商族内部林立的大小氏族,使其形成拳头一致对外,迫使成百上千个外族“方国”臣服自己刚刚建立的新王朝“殷”,成汤决定,“商”这族号仍要保留,并对何时称“商”,何时称“殷”,作出界定,立下后世商王必须恪守的“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并据此“殷商并用族规”规定商族内部的一切族事活动,如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贞问战争胜负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等,一律称“商”,而不得称“殷”。成汤制定这一“殷商并用族规”的实质是要求后世“集商王与殷帝于一身”的“天下共主”必须恪守成汤所立的“在族内行王权称商称王,在全国行天子权称殷称帝”的规矩,而不可乱称。因为甲骨卜辞是商族内部族事活动的产物,它当然会频频出现“商”“商王”的称谓,而不允许出现“殷王”“殷帝”的称谓。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的是“国史”而不是“商族家族档案”,所以在《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迁对成汤的国号全称“殷”,对殷天子全称“帝”,而《史记·周本纪》记载的是周武王征伐殷帝辛或商纣王【笔者插注:查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谓:“(今)《尚书》纣字,《古文尚书》作受。”因知,世说“纣王”为贬称,实误。

(紧转 P6)

